

●纪念许涤新同志逝世两周年●

编者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同志于1988年2月8日逝世。今年7月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市经济学会和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学会联合发起在沪举行纪念许涤新同志逝世两周年学术讨论会。胡寄窗和蒋家俊教授的文章，是在这次讨论会上的发言稿。

追忆许涤新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

●胡寄窗

我与许涤新同志接触的时间并不多，1978年他到上海来组织《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写任务，我才同他第一次见面。在此以前我只阅读过他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初版，此后在《辞典》和《大百科·经济卷》的编写过程中有较多的接触机会，但仍不算是有较密切的往来。虽然如此，我自己作为一个经济思想史的专业工作者，对于任何一位有贡献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成就有责任进行研究和整理。我认为在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孙冶方和许涤新两位同志是最值得称述的。这里，我仅从经济学说角度对许涤新同志的贡献提出几点看法。

首先从纯学术方面看，许涤新同志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他一生最主要的贡献。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自恩格斯于1877年提出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虽有少数苏联东欧经济学家曾在这方面作过一些努力，均不能说是已实现了恩格斯的期望，连苏联在1954年刊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不例外。因为此教科书的前资本主义部分太简略，而社会主义部分却占全书一半以上，前后不相配称；更为重要的是其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各有它的独立体系，彼此不相关联，缺乏贯串全书的理论原则。许涤新同志《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版坚持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演变为贯串全书的线索，并对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体系等的内在特征以及两种生产方式间的更替过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经济范畴作为分析工具，写成第一部占有丰富中外史料和现实例证而又是前后体系协调和理论连贯的巨著。这在经济学领域就是一个创举。当然，要建立一门完备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个很艰巨的长期任务，不是某一位经济学家所能独力完成的。许涤新同志在以《资本论》总框架为局限的狭义政治经济学还占绝对支配地位的40年代，就设想编写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已是极大的尝试。又在此后紧张的革命斗争和繁忙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经过40余年的辛勤劳动先后刊行《广义政治经济学》初版和修订版，其钻研和创建新经济学的奉献精神已是难能可贵，尽管这门学科尚未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而许涤新同志的筚路蓝缕的首创功绩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其次是重视以理论指导实践。许涤新一生的丰硕论著所体现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范例，一向为学术界所称诵。我认为他在经济理论方面更为突出之处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并在工作中不断加以贯彻实行。1949年5月底许涤新同志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任军管会财委副主任并兼任几种行政工作时，已意识到财经干部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于百忙中与复旦大学联系筹办一个经济研究所专事短期培训经济管理干部，经过3个月的筹备于10月份就招

收第一批研究生。粉碎“四人帮”后，他于1977年7月以古稀之年出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在履新的头几天即赴北大与陈岱孙教授联系，建议双方通力协作以促进经济学的发展。同年8月以后又匆匆分赴全国各大都市组织经济学教授和专家编写《政治经济学辞典》，旨在普及经济科学知识并为经济管理干部提供经济学必要参考知识。1978年又创办《经济管理》杂志。许涤新同志的这一系列活动的目的不外是要积极扩展经济学识以便指导经济实践。他的这些活动的指导思想是很杰出的。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人们常将经济学及其分支学科视为资产阶级的货色一概予以摒弃，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其重视哲学的程度也大于政治经济学。在这种气氛下，全国近百所财经院系的被裁撤合并，仅保留了极少数几所，以致形成经济理论和管理人才长期缺乏的局面。数十年来我们在经济工作方面出现不少失误，走了许多弯路，原因虽多，而缺乏应有的经济理论知识却是最根本的原因。80年代开始情况稍有改变，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此种情况决非短期内所能补救。假如许涤新同志在解放初就已积极追求的加速培养经济人才的战略能被肯定并持续加以扩展，数十年间培养出来的经济人才为数应以百万计，何致于犯那许多不必要的经济错误，走那许多弯路。经济人才之短缺仍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难点之一，许涤新同志的这一观点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仍有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还有一点须指出，人才资本之重要意义，在西方到60、70年代才开始提出并广泛传播，许涤新同志在40年代之末就曾实际推行，他的这一观点在世界范围内也算着了先鞭。就企业管理学科而言，在那时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中，均被看成是为资产阶级剥削而服务的工具，许涤新同志特别强调财经管理干部的重要作用，可谓不同凡响。至于在那个庸俗的片面强调实践的作用的年代，而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更是科学的卓见。

又次是开扩的经济理论视野。许涤新同志终生致力于《资本论》的研究，无论是在“牛棚”里或在“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盛行的情况下，他均一贯坚持研究《资本论》，是一位极忠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他决不是墨守成规的教条主义者。这就使他能以开扩的胸襟和对待经典著作的科学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促进各种经济分支学科的发展或创立新的边缘学科。许涤新同志在这些方面贡献也是极为突出的。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和《大百科·经济卷》，除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辞条外，还汇集很丰富的中外经济史、中西经济思想史和各部门经济学的辞条，旨在扩大读者的经济理论视野。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他是第一位突破禁区从事于中国人口理论问题的研究而驰名国内外的著名学者。他除了早年不同意“以粮为纲”的方针和晚年对人口问题之关注外，还致力于生态经济的研究，成为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倡导者。许涤新同志运用学术讨论会和建立学会等方式以广泛开展经济科学研究的贡献也是很显著的。他积极创建了《资本论》研究会，创建了中国人口学会，与自然科学家马世俊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生态经济学会，至于他热情地鼓励和支持各种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讨论会的事例，更多得难以一一列举。这里，我顺便讲一件经许涤新同志的支持才建立起来的新学科的事例。这件事人们很少知道，甚至许涤新同志本人也未真正意识到。这是指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之建立。此学科是近年来发展成长较快的新专业之一，到现在全国已有4个博士点和8、9个硕士点。它的发展当然有赖于从事这门学科的同志们的努力。但在此学科创设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许涤新同志的直接间接的支持，恐怕就很难建立起来，更谈不到有更大的发展。我作为这门学科的主要创建人之一，而公开承认许涤新同志对本学科之建立所起的重要作用，不会是没有理由的。

总之，许涤新同志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及其结合我国经济实践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在各种经济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领域运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所起的开拓作用，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是无与伦比的。

● 蒋家俊

纪念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先驱 许涤新同志

集革命家与理论家于一身的许涤新同志，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他一生丰富的革命实践和学术活动中，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为之付出了无数的心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许涤新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想努力解决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问题，当时，周恩来同志曾给以很多支持和鼓励。1945年，他应陶行知和李公朴的邀请，为重庆“社会大学”试用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讲课，由于讲课内容同中国经济的实际相结合，受到热烈的欢迎。以后，从1946年到1949年，在上海和香港工作期间，在紧张激烈的战斗生活中，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执笔撰写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从原始公社一直写到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

上海解放初期，许涤新同志担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工商局局长，忙于接管，打击投机，市场管理和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同时又兼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并亲自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在讲授中一再强调理论必须和实际相结合，实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给我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曾想把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三卷的对象，但因为作为我国过渡时期很短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方式，所以没有能够写出第三卷。大家知道，许涤新同志后来担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副部长等职务，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过很大的贡献。1962年出版的《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分析（1949—1957年）》一书，就是他对我国过渡时期经济的理论概括，但是并不能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三卷。

十年动乱期间，许涤新同志受到长时间的监禁和折磨，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重新研读《资本论》，写下几十万字的笔记，以马克思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除以后的有关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论述为线索，来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后来五易其稿，于1979年出版《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一书，但这只是作为读《资本论》的笔记，还没有构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许涤新同志在文革以后，一直想重新修订解放前出版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和第二卷，并续写第三卷，为此曾多次虚心征求我和我的同事们的意见。因为我近四十年来一直在复旦大学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文革以后，又担任国家教委全国统编教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南方本）主编之一，此书自1979年以来共出5版，前4版每一次出版后，都送请许涤新老师指教，并同他研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许老也将他写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等论著送给我，并谈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